

■热点追踪

# 开辟物人关系的新维度

## ——从博物馆定义变化看人类遗产保护利用新趋势

曹兵武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布拉格大会以投票方式通过了博物馆的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这次博物馆定义修订持续数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反映了当今时代人们对博物馆机构性质以及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类遗产态度的复杂性和高度认真的态度。

作为社会重要的记忆器官和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是人类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且极具代表性的构成部分。尽管博物馆的藏品基本上都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但是博物馆对自己工作对象、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的认识和界定，是典型的专业和公众相交织的一个领域。最早的博物馆形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博物学传统，如果从单纯的收藏与欣赏的角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期。收藏、研究，或者说为研究而收藏，是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哲开创的博物学范式。公共性——将收藏公共化、公开化，通过展示服务社会和国家，是现代博物馆诞生的标志。启蒙运动后诞生的第一批真正的现代博物馆比如阿什莫尔博物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职能与使命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公共性、科学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特性都已经具备了。尽管博物馆处理的是可移动性的收藏品，但在遗产领域中，博物馆相对来说最为源远流长，也一直置身于前沿和引领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5年11月成立，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11月成立，1947年10月国际博协和国际教科文组织签订了《关于两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途径和方法》的协定，成为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博物馆事业规划的合作伙伴。并逐渐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活跃的联系组织之一。联合国的成立是二战之后的一个重要成果，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话协商消除战争，促进人类和平发展。教科文组织则是希望通过教育和科学来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将战争消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该组织成立时其巴黎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因此，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博物馆与遗产保护及其作用，以文化遗产作为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间文化交流、对话的媒

介，专门创办了聚焦博物馆与人类遗产的专业杂志《国际博物馆》(后来移交给了国际博协)。国际博物馆协会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定期审视博物馆的发展状况与未来议程，检讨对博物馆的定义，将业界对博物馆机构使命、功能领域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的最新认知融入定义与协会章程，引导和规范博物馆业务的开展，所以才会有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修订博物馆定义的现象。从1946年至今，不包括这次布拉格大会的最新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曾经推出过八个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官方定义版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变化和包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博物馆工作对象的不断扩充与有机化、关系化。定义最初完全采取列举方式，即凡向公众开放藏品的机构就是博物馆，并点名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没有常设陈列室的图书馆除外，突出的是藏品和开放。1974年第四版修订时，“藏品”被改为“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2004年第七版时又改为“关于人类与人类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见证物”，2007年第八版时确定为“关于人类与人类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并延续至今。藏品、见证物和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性遗产的出现，内涵的扩张也包含着价值的拓展，体现了让馆藏不断活起来，与人建立更为全面深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向。

二是工作目的的不断扩展、细化与逻辑化。1952年第二版修订时在“开放”之前加上了“供观众欣赏、教育”的目的限定，1962年第三版时改为“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1974年第四版时改为“学习、教育、欣赏”，1989年第五版时改为“研究、教育、欣赏”，2007年第八版时改为“教育、研究、欣赏”。国内同行特别看重几个目的的排序可能暗示着重要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1962年的“研究、教育、欣赏”更能体现博物馆工作目的背后的逻辑关系，和上述博物馆工作对象的有机化、关系化相结合，展示了一种不断展开的逻辑性，居于首位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枢纽型地位，不仅在这次最新定义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后边讨论博物馆职能界定中同样被再次提及。

三是博物馆职能即博物馆的业务界定，也是定义高度关注的重要方面。1952年第二版修订时在“开放”之外加上了“保管、研究”，1962第三版时改为“收藏、保管”，1974年第四版时改为“收集、保存、研究”，1989年第五版变化很大，以“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来比较完整地概括博物馆的职能或业务链，并得以沿用至今。这一部分是博物馆专业精神与水准的体现。

总结上述三个方面，无论如何修订、变化，其实收藏、研

究、展示一直是博物馆作为机构须臾不能剥离的存身之本。“藏品”与“开放”在第一版中就已经出现，分别等于收藏与开放，而两者的完善，则需要建基于包括藏品研究、观众研究和博物馆业务研究的博物馆学的支撑之上。可以说，没有收藏，博物馆就丢掉了“物”；没有展示，博物馆也就不能叫“馆”，而且势必退回缺乏公共性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藏宝阁；而对收什么、藏什么、如何展等博物馆业务的开展，要通过研究，以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予以展开。至于“为了什么”这样的博物馆安身立命的机构使命，离开了这博物馆的“三基本”尤其是博物馆学研究，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每一次新的定义也都会对博物馆机构自身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定位与性质有侧重不同的完善与强调。比如在1952年第二版定义中就增加了“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的界定，1974年第四版定义中在“机构”之前又增加了“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定语并大致上一沿用。不仅如此，1974年的定义还首次明确囊括自然与人文，将博物馆的工作对象高度概括为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见证物，体现了博物馆面对社会变化在自我认知方面极大的提升和调整，不仅是新博物馆学出现及其研究成果在定义上的体现，也回应了业已兴起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观念及其推动的世界遗产运动、可持续发展观等的广泛影响。

这次最新修订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增加了“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的大段表述，主要是对博物馆的工作目的与工作方式提出了可及性、包容性、体验性和道德方面的明确要求，并突出强调了“社区的参与”。一些人认为新要求标准过高，空洞、苛刻而难以实现；一些人认为面对新形势和新需求，博物馆的确应该对机构使命进行更清晰、细化的界定，对博物馆的工作方式提出更多、更高的道德与专业要求。

其实，结合近年来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尤其是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上通过的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起草的《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作用的建议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博物馆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博物馆对自身所管理的人类遗产的巨大价值与社会责任具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性。一方面，博物馆无论作为行为主体还是文化遗产

(上接10月11日6版)

## “博物馆之城”的发展思路与实现路径

张颖岚

### “博物馆之城”的实现路径

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大学校”功能，深入挖掘博物馆“城市记忆”元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博物馆走向社会，走近民众，成为守护城市之魂、赓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推动“四史”教育、涵养文化自信的精神家园；还要进一步拓展活化博物馆的“城市空间”作用，彰显博物馆的“城市魅力”影响，激发博物馆的“城市动力”潜能，使之成为公众感受城市温度与活力的平台，获得情感认同、汇聚人才资源的支点，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在具体规划“博物馆之城”的实现路径时，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优化布局，稳增数量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曾谈及，“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布局很不均衡、发展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地域、层级、类型、属性的博物馆，在发展规模、速度与质量方面，仍有明显差异……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的主流，占了近80%，以至于人们经常将博物馆和文物直接画上等号。博物馆绝不仅仅只是收藏文物，而是收藏各种类型的人类发展的物证和自然环境变迁的物证。”

针对我国博物馆目前存在的类型相对单一、层次不够丰富、空间分布不均衡、有“高原”无“高峰”等发展态势，在规划建设“博物馆之城”时，首先还是要立足一座城市已有的博物馆基础，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盘活存量博物馆资源、促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而不是单纯追求博物馆数量的增加，或者是大体量、大手笔的新馆建设。其次，是辩证分析现有博物馆的数量、类型、层级、活力的关系，并结合所在城市的特色与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优化博物馆层次布局，有针对性地补齐类型、层级、空间分布等不同方面的缺项短板，尤其是关注与支持小微博物馆、社区（乡村）博物馆、类博物馆等这些“全天候”、市民身边的博物馆，以形成覆盖广、丰富多样的“博物馆之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激发活力，提升质量

2020年下半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了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从通过定级的520家博物馆评估数据来看，一级指标中“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的平均得分率最高，达77.5%，“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仅有51.5%，二级指标中的“展览和教育”平均得分率为69.2%，“公众服务”为68.7%，“影响力”为56.3%，“学术研究与科技”则仅为31.4%。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在类型、数量、馆舍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学术研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却还有许多可提升空间。

因此，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重点还是要聚焦在博物馆的自身能力建设方面，这是“博物馆之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内部能力提升方面，不仅要加强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等基础功能，还要增强博物馆对各类人才的集聚作用，以提升博物馆的科研学术水平；同时也要通过探索与实践富有活力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强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和传播效能，以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 构建国际博协博物馆新定义的中国化阐释体系

杨瑾

通过系列化行为/功能与对象之间产生多种关联，兼具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重性，后者以可靠性、可行性以及具体运用上的直接实践性和普遍有效的实用性，如社会价值、受众体验与社会关系等，与前者较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中国的博物馆实践而言，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训诂作为一种认知现象的有效方法值得借鉴，因为其追求确定性的宗旨能够有效化解西方阐释学语境下博物馆定义中那些不确定性，可以从方法论上为博物馆本体论追求，即追求博物馆真理，提供坚实的在地化理论支撑。

**秉承开放与包容并重原则，实现博物馆+多学科交叉与融合。**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定义修订过程中体现出的“包容性”“多样性”界定了博物馆作为“机构”本身的社会化立场，对于在这方面已有充分实践的中国博物馆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秉持科学求实求真精神，不断促进博物馆发展的“可持续性”“可及性”。从当前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事实出发，不断“反思”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价值与意义，辨识挑战与机遇，加大开放创新力度，通过博物馆+思维拓展跨界合作的纵深度，在学习、借鉴与吸纳基础上创造科学的实践方法。从整体上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格局在各种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在格局上，通过不断提高自身专业化能力而打通了博物馆社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覆盖式发展格局大大提高了“可及性”。在社会参与大环境下，博物馆不断回应“社区”“参与”需求，增强与社会公众的紧密联系。如何推倒心中最后那段围墙，还需进一步思辨与自我突破。

**着眼关照未来的发展格局，构建系统性与完备性兼具的阐释体系。**

针对中国博物馆发展趋势，对于博物馆新定义的本质、动力、目的、方法、规则、有效性标准等进行学理探索，根据具体发展形态与上述诸要素建立融通性逻辑关系，构建能够映射当代并指导未来的、凸显理论探索与实践形态完备性的中国博物馆阐释体系。结合九部委《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我们要以“风格气派”“话语体系”为框架，以中国当代博物馆语境方法为基础，采取中国语言的研究和阐释。这种新闻释体系应强调表意性的汉语汉字所塑造的博物馆定义的客观性、民族性、差异性。例如，在阐释对象、方法与材料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性语境下，中国化的阐释体系应以意义为重点，客观地实证博物馆的指导思想、发展理念与路径，以求真实为精神引领，由定义还原到本体，实现方法论上的感通与达成以及本体论上的公共属性。此外，中国特色的阐释体系应在定义概念基础上生长出具有分辨性、反思性与创造性的功能，为赋能中国博物馆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为博物馆新定义一般性意义上的应用提供中国独有的方法论。

总之，中国博物馆百余年建设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指导思想与学术传统构成了博物馆新定义中国化新实践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以及系统而完备的新闻释体系的新语境，因此，整体性理论与实践探索都是可能的、值得期待的。在博物馆新定义的中国阐释体系中，博物馆并非定义所界定、所固定的社会存在，而是基于对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的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不懈追求，是由概念发展出一整套成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并可以运用于当代中国博物馆多类型、多层次、多属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博物馆定义的修订过程看似一场长达五年半的全球性专业术语与概念的大研讨，实为当代全球博物馆在经历重大社会变革过程中对其身份与角色的不确定性/确定性方面的一次集体性再辨识、再确认与再构建历程，即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元素的“最大公约数”。博物馆新定义发布之后，各成员国必将经历一个认知和实践的新探索过程，比如，在新定义框架中反思博物馆实践形态与社会发展的相宜性、协同性等问题，期冀和型塑新远景与新定义之间的关联和张力。正如复杂而严谨的修订过程，对新定义本身的共情性理解与阐释也应该具有包容性、透明度和参与性。至于在详备地囊括其语义上的六大维度，即实体维度、行为/功能维度、对象维度、社会价值维度、体验维度、教育与关系维度，还是审时而度地部分结合，抑或仅仅作为框架或参考？笔者认为，中国博物馆应着眼于当代中国博物馆发展模式和中国博物馆学体系的自主建构过程，对博物馆新定义予以辩证性思考、参考性借鉴、合理性应用，凸显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格局和话语体系。

**从自身文化思想与经验出发，紧密联系当代博物馆实践形态。**

进步史观下的中国博物馆百余年发展历程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式演进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参与、见证且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因此，在充分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新形态的前提下，缜析博物馆与社会之间多维关系与互动路径，聚焦国家发展战略，不断提炼与升华中国特色。参照博物馆新定义，以他山之石，以中国智慧，探寻具有国际视野和互动能力的博物馆新业态，提升理论化的中国特色的传播效力。因此，我们首先应在全面总结当前中国博物馆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实践形态和学科资源中的中国特点与中国范式基础上，以制约瓶颈和发展目标为导向，对博物馆新定义予以完整而科学的中国化阐释。其次应该尊重国际博物馆协会其他成员国及其阐释路径、处理好与西方语言学关系的问题，加强交流互鉴与平等对话，坚持阐释的主体性、语境性和创造性。如当前中国博物馆实践中对于内外关系的处理模式，特别是作为机构实体的内部运行系统是否要按照“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表达顺序和主次关系，及其所界定的社会化关系网络中对于机构作为实体本身的价值评估与认同？如何避免机械地挪用或照搬，根据我国博物馆整体发展环境和单个博物馆自身具体定位而进行总结提炼？

**从博物馆新定义的语法范畴与论证逻辑着眼，通过中国阐释学框架予以整体性阐释。**

语言和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表意性汉语汉字决定了博物馆新定义语言学诠释和应用的中华性，为此，首先应从中国阐释学语境下，以训诂本义之诠释为起点，以中华民族语言学研究为基础，以衍生新意之阐释为旨趣，为新定义赋予中国能量。其次应以解释学或传意学为框架，从语言解释或传意角度来辨识、解读新定义，将其融于民族语言概念与语汇体系，最终实现民族性语言与思维阐释融会贯通的完备形态，创造自己的概念诠释与应用体系，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三应采用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与思维方式进行多维语义转换，正确理解新旧定义的思维过程与逻辑关系及其中国化实践语境，构建由民族文化基因所界定的阐释范式。

**以方法论和本体论并重为统领，通过方法论促进本体论的超越。**

就博物馆新定义本身而言，作为物性实体的博物馆旨在

(下)